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五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二〇期 ——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12e）

【人物追踪】聂元梓琐事	刘 若
【历史文献】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林 彪
【旧文重登】夺取新的胜利——《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5 期社论	
【旧文重登】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三十三）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追踪】

聂元梓琐事

• 刘 若 •

（一）收到自己的死讯

2000年9月30日《今晚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题为《文革学生领袖今昔》的文章。首先出场的是“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栏的最后一句话是：“不久前，聂元梓结束了她73岁的一生。”很遗憾，这句话是错误的，聂元梓至今仍然健在，现年79岁。更令人奇怪的是该报在本年的1月6日又从《读报参考》上摘登了同样的内容。聂元梓本人收到自己的死讯这已不是第一次，在这以前曾多次有人向她通报什么地方刊登或听什么人说她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吉林、海岛、澳门、美国等等。

她第一次得知自己的死讯是在1994年，有人交给她一份《购物导报》。报上刊登了她已去世的消息。她当时正处在贫困交加之中，收到自己的死讯隐隐有些庆幸，心想打个官司赚笔钱。正好贴补生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打这么个简单的官司也要有钱，××律师向她讨起码的费用时，她竟是分文拿不出来。没办法只好做罢了。

有人听说此事之后，对她说：“你真傻，你还是应该打。你可以告诉律师打赢官司后赢得的钱，两人按比例分成。”聂元梓回答说：“我想到了，不过想想这官司打着没劲，不就是个死活问题么。我站在那儿，官司就赢了。打赢了也摘不掉我头上的一顶帽子。算了，让人们去说吧。一时半会儿我死不了。”

（二）拒收感冒药

1996年秋的一天，一位朋友出差前，来到我家，提了一大兜子的药，让我转天给聂元梓送去，因为她从1984年保外就医以后，便成了三无的老妇（无房、无工资、无公费医疗）。索性我也把自己没吃完的药，管它过期没过期的敛了一些也带了去。

来到聂元梓住处，据说是她二姐的房子，暂借她住。这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十分简朴，却很敞亮。我把药摆在桌子上，她见了很高兴。拿着放大镜对着各个药的说明一一仔细看过。把大部份药收下了。只剩下一小部份。并说：“这些我不要了，你还带回去吧”。我一看，剩下的全部是感冒药。按说感冒药是每个人必备的，她居然拒收感冒药。令我非常诧异，便问她：“为什么不要感冒药？”她的回答更使我吃惊不小。她说：“我从来不感冒。”停了一会儿后她又补充说：“我也拿了一些，万一不注意感冒了的话，我一定让它一天就好起来，绝不让它拖到第二天，这些药就够了。”

我与她的往来，这是第一次感到我不只是一个施主。便虚心地向她讨教。因为在这之前，我经常患感冒，而且每次都是旷日持久，少则一周，多则一个多月。听她讲过以后的几年里，我也很少感冒，即使感冒了，也让它一天就好起来。

（三）小小记帐本

聂元梓有个小小记帐本，这是一个独特的本子。本中的记录每条最多的有五项：人名、钱数、电话、地址和时间。最少的是两项：钱数和时间。钱数最少的是100元，其余有二三百元、五百元、一两千元，最多的还有一万元。

这里记录的是她出狱后，一些了解她的困境的人们送给她的钱。基本线条是某人送她多少钱，此人的电话、家庭住址以及送钱的时间。送钱的人有老朋友，过去的同事，有老师、有学生、也有文革中对立面一派的人，还有的人根本就没留下姓名。例如：1975年有人送她2000元，但却让转送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聂元梓曾多次去打探施者。并在1998年试着给她送去贺卡。但是该单位说查无此人。所以至今小小的记帐本上，姓名、电话、地址还是空项。所送的钱不管多少对她都十分珍贵。当你身无分文，当你吃了上顿没下顿时，100元钱尤如雪中送炭。当她意外地收到1万元时，首先做的是一件事便是去医院看病。在这之前，她也曾多次看病，但是大多只是看而不治，大夫开了药方，多半都没取药。

这次她仔细地看了。因为有支付透视、拍片子、做CT、化验、理疗的钱了。这样一来，用她的话说救了她半条生命，因为X照片显示她的腰脊错位1.8度（完全错位为3度），这表明她脊椎只有1.2度的搭接，一不小心就可能完全错开，便会造成长身瘫痪。不只是腰腿病，而且在这之前她的双眼几乎失明，还有严重的心脏病。有了这笔钱她才得以检查和治疗。

她一再强调不论钱多钱少，每笔钱对她克服困难，特别是对她精神上的安慰，顽强地活下来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外，她还说这是一个极不完善的小本子，因为只记录了送的钱，而

没有记录多年来，人们送她的东西，比如衣服，布料、蔬菜、水果、营养品、药物、桌子、板凳、铅笔、纸张、书籍等等等等。实在是记不过来了。

她经常说：“在财物上，我是个彻底的无产者，但在精神上，我是个阔佬。那些百万富翁们，绝不可能有我这么多的深深被感动的感受。”

（四）电视机与不明飞行物

来到聂元梓的住处，门的右上角摔着一小卷电视电缆线，秃头露在外面未引进屋。原以为她没有电视，不过一进屋便看到雪花电冰箱上有台9寸黑白电视机。小小屏幕上的图象摇摇晃晃令人眼乱。过去动动羊角天线，她马上让我别动，她说她已经精心调过了，那是最佳状态。真是没法看，不过声音倒是没有太大的失真，听得还算清楚。她说就是听听新闻和天气预报，当个收音机用。临走前，我还是劝她调了调，终于调出了两个台，虽然不太稳定，但有时可以看看，也算享受到电视了，她看了也非常高兴。

过了些天，聂元梓来电话说，昨天电视说今天晚9点要播送南方不明飞行物的节目，现在已经9点半了，怎么还没有播出呢。恰好，我也想看这个节目，便告诉她不是今天，而是明天，而且不是她说的那个频道，是另一个频道，她那个电视机看不到。她对不明飞行物光顾地球这样一件与吃、穿、用毫无关系的事情竟如此热心，令我费解。她说，她以前就一直对飞碟、外星人这类问题感兴趣。而且坚信，不只是地球上有人类，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以外肯定还会有与人类类似的生物存在。

五）等人换灯泡

今年年初的一个傍晚去聂元梓处，她正在厨房做饭，天已经很黑了，她怎么不开灯呢？是没电了？可是旁边房间的灯是亮着的。一问才知道，是厨房的灯泡坏了。我说马上去给她买一个，商店也许还开着门。她说，不用去买。因为三天前灯泡就坏了。当天她就买了新灯泡，只是因为年老体胖，爬不到桌子上去。所以没有把灯泡换上。

这老太太，真有耐心，三天摸黑做饭，也不找个人帮她换上。我一边想着一边爬上桌子，准备把灯泡给她换上，没想到还换不成，因为原来的灯口是卡口，而她买的灯泡是螺口，还得去换灯泡。我问她：“如果今天我不来，或者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没有人来怎么办？”“那怕什么，十天半个月没人来也没关系，不就是黑点么，顶不及我可以早点做饭。另外，还能老不来人，这不，今天你不就来了嘛。”她不以为意地回答。“为什么不找邻居帮个忙换上灯泡？”我又问。“我要找邻居办的事太多了，比如说这个大立柜的一扇门掉下来了得装回去，又比如说我这个桌子想换个地方等等，难道我都找邻居？我想不是万不得已的事，绝不找。这些都是小事，算不了什么。”

（六）知恩图报的郭老头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一起去聂元梓处，刚要敲门，突然看到门旁多了一个小小按钮开关。轻轻一按便听见清晰而又亲切的声音“你好，请开门。”这是个点子门铃，真不错，马上聂元梓便开了门，引我们进去。

一进屋我便说：“鸟枪换炮了，今天可省了砸门的气力了。”走进里屋，桌子旁坐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聂元梓向我们介绍：“这是郭老先生，这个电子门铃就是他给我装的。”我们多次来这里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头，不知他是何许人也，而且一出场便帮聂元梓干了一件很小

的大好事。

看到我们好奇的眼光，郭老头主动介绍说：“聂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听这话我们更加疑惑。心想他八成是把话说反了。他可能是想说：“我是聂元梓的救命恩人。”因为几十年来聂元梓都是在为不死而抗争，怎么还可能救别人呢。老头似乎有所察觉，解释到：“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我只是因为会讲日语，做过日文翻译，便被打成日本特务。他们抓我，整我。在这生死关头，我到北京大学找了聂老师，说明了情况。二话没有，她便让人保护了我，使我避免了一场人生灾难，否则的话，当年我肯定是被打死了。”

原来是这样，我又问聂：“你们文化大革命前就认识吧？”“不认识。”聂回答“不过我在东北工作过多年，我知道东北有很多人会讲日语。比如我工作过的哈尔滨，解放前就有小公共汽车，乘车的人必须会外语，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因为报站都是用外语，日语或者俄语。可见会讲外语的人数之多，怎么可能都是外国特务呢。文革中，老郭（那时还不老）来找我。当时北京打、砸、抢、乱抓人、乱打人、揪斗人十分严重。我听他说完，便找了张×帮他安置了一下。过后再也没管这事，连他死活也不知道。没想到三十多年了，他又冒出来了。”

老郭接上去说：“我多年来到处打听聂老师的下落，都说不知道。还曾经听人说她已死了，后来又听说还活着。托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她的电话。给她打电话，她又说算不了什么，不要这个那个的，老说忙。还拒绝我登门拜访。”“本来就是，我又没出多大力，算不得什么，年青人没经验，当时，和我同年的大多数人都明白，都不会胡来的。”聂又说。“后来，我自己找上门来了，没想到聂老师精神还很好。”郭老头结束了故事。

我有些被感动，不是为救人者而是为被救者感动。我说：“郭老先生是好人，知恩图报。过去说这是当然的，现在说这是很难得的。”“最可贵的是，他不怕粘包。”最后聂元梓又拔了一节儿。

（七）如何死

今年年初的一天，聂元梓来电话说：“我的自传已经写完了。这是我多年来与命运抗争，顽强生活下来的唯一支柱。现在写完了，我有种下岗的感觉。我的下岗与一般意义的下岗还不太一样，是一种人生历程已经走完了的感觉。”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活着是为了写书，写历史。为了说话，说真话，尤其是说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现在我想到的大多已经说了，当然还有许多我没想到的，比如，前不久有人问我有关社教运动的事情，这两天又有人问我经商的过程。今后凡是我想到的或是人们问到的我还会继续写下去。但是，目前我更多地想得是如何死的问题。人生不在于长短，人死不在于早晚。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地活着。活，要活得有意义；死，也要死得有价值。”

~~~~~

## 【历史文献】

###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 林彪 •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话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 1966年12月16日

~~~~~

【旧文重登】

夺取新的胜利

——《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社论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

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越来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

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扫除一切绊脚石，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

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之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是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有些人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并没有做认真的公开的检讨，不肯给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他们还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群众，继续组织被他们蒙蔽的群众，来打击革命左派。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包庇他们自己，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人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来打击革命群众，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坚决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份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派工作组也好，不派工作组也好，撤了工作组也好，只要是采取这样的反动方针和反动政策，就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形式，而在于实行什么方针，什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由原来的负责人领导，也同样犯了错误。有一部份工作组采取了实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并没有犯留误。

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

现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极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在幕后，操纵受他们蒙蔽的学生群众组织、工人群众组织，挑拨离间，制造宗派，挑起武斗，甚至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这些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这样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最愚蠢的。他们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一些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觉悟起来，揭发他们，反对他们。群众的绝大多数总是好的，总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暂时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认清了那一小撮玩阴谋、耍诡计，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真面目，就立即会唾弃他们，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坚持文斗，不要武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个政策对无产

阶级有利，对革命群众有利。只有坚持文斗，坚决反对坏人挑动群众之间进行武斗，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故意制造事件，挑动武斗，就是为了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有不同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在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必须认真改正错误，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认真改正错误，就要：（一）诚恳地老实地向群众作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实行真正平反，给他们恢复名誉；（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四）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五）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广大群众，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实事求是的。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能够获得广大革命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就能够做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那就非垮台不可。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开展以来，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每个革命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列宁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为指南，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各种现象，分析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的动向，研究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和提高领导核心，进一步提高斗争的艺术。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和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商量，讨论问题，善于团结广大群众，要欢迎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 1966年12月13日

~~~~~

【旧文重登】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请看，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

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以往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状况。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愿望。劳动人民进了清华、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大学生。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教育史上的革命。这个根本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一新生事物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显示出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他们上大学是很有好处的。他们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明确了方向，这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他们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这是过去那种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从工农兵中招生，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

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



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兵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学校的大门。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工农子弟曾被污蔑为“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校门。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容许重演。如果有人要从理科开刀，重演这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有权质问：这样搞，不也是要用“泻肚子”的办法将工农兵赶出大学校门吗？

## 二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兵，在学习期间还要不要与工农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学理论，学技术，学文化，还要不要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还要不要不断改造思想？这是关系到工农兵学员沿着哪个方向提高，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而教育界那种怪论却把开门办学歪曲成“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主义大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学校有各种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生要上这样那样的课程，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有这些，都是不能离开三大革命运动的。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社会主义大学应当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引导学生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对技术精益求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列宁指出的，“全部关键”在于“把青年的学习、组织和训练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而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改造”。学生只有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与工农相结合，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正确目的，才能产生真正强大的学习动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科学文化堡垒。只有立足于教育革命，批判封、资、修的学科体系，彻底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才能使學生既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实际知识，“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谈得上什么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几年来，清华、北大发动广大师生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北大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最近评论《水浒》来组织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以“史”的课程而论，过去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现在努力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过去尊儒反法，现在努力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过去厚

古薄今，现在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清华大学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把学生的学习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这几年共完成近千项生产、科研任务。水利系以万里黄河为课堂，坚持为治黄服务，为农业服务。治河泥沙专业十二名学员和三名教师，到山东某地结合“引黄放淤”的科研任务进行教学。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打破书本上的老框框，完成了放淤工程设计。经过广大群众的奋战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项工程今年一次就淤出五万一千七百亩良田。学员既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又学到了丰富的实际知识并在理论上有新的创见。化工系二年级，在完成了一项填补我国技术空白的化工设计以后，师生共同编写了《化工车间设计》等两本教材和两篇科技论文，总结了工人的实践经验，并把设计中有创见的六项革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由此可见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过程，就是始终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的过程。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种捏造。

开门办学，出去以后，也仍然有一个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我们两校注意引导师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农兵一起战斗，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虚心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并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积极改造旧教学体系。如果在下厂下乡过程中不与工农结合，不认真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去锻炼思想，而把旧的一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照搬下去，不花气力去切实组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那就不是真心实意地实行开门办学。我们两校始终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努力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学员，使他们在政治与业务两方面都得到锻炼，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既懂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又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迷信书本，敢于创新，成为又红又专的战士。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老路，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 三

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总是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而必须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旧北大、清华号称什么“最高学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可是，摇来摇去，许多学生被摇得晕头转向，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有的人怕苦怕死，不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现在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电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

长诗《理想之歌》，出版之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就立即奔赴灾区。在余震未平，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财产，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果，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的谬论。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编写了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俱在，不容抹杀。试问，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究竟是

“不如过去的中技高”，还是旧大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成绩是这样显著，对比是如此鲜明，为什么还出现了对质量问题颠倒是非的种种怪论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怪。毛主席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人却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加以歪曲，实际上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当“劳动者”扔到九霄云外，眼睛只盯住“文化”。我们必须警惕有的人故意混淆重视智育和“智育第一”的界限，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的一套陈旧货色。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说穿了，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一”。“智育第一”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吗？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绝不赞成。”搞“智育第一”，就是要继续让旧教学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 四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清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封、资、修的势力盘根错节，攻也攻不动？为什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之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这几年学校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林彪一伙对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阻挠和破坏，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权。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保证。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要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实质就是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为什么差差答答、不敢和盘托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呢？无非是这种货色太臭了，拿不出手。于是，接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口号，对外行加上“热心科学”的限制词，妄图以“不热心科学”的莫须有的罪名，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让那些“热心”搞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来把持教育领域。这就是他们要“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

但是对这套办法，我们并不陌生。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决不是想发展什么科学而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搞什么“教授治校”，即由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曾派出一批批干部来到清华、北大。他们先是被资产阶级诬蔑为不懂科学的“土包子”，但后来其中一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腐蚀，对阶级斗争越来越不关心，把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置诸脑后，却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修正主义那一套越来越“热心”。结果呢，不但科学没有搞上去，自己倒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现在，有人竟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拖回到资产阶级右派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清华、北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正反面经验，都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真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又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使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蓬勃发展。许多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教育阵地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必须要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这样，才能把教育革命的光荣任务坚持下去。

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最近几年才开始。它不是过了头，而是刚起头。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它一出现，就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光辉灿烂的未来。自然，它同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样，总要经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我们的教育质量决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还在发展、提高。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旨先要看本质，看主流。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忽略，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如果抓住新生事物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利用一些同志暂时不理解、不适应的状况，否定教育革命的主流和方向，广大革命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毛主席亲自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又亲自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要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大、中、小学学生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 《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12 期，《人民日报》12 月 4 日刊载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三十三）

• 周孜仁 •

在吴庆举遭遇政治危机同时，我的私人生活也面临着危机。这是1968新年给我的记忆。一年前的元旦，正值“无产阶级大夺权”前夜，每一个日子都让人热血沸腾。大学时代读过一本美国记者写的十月革命实录：《震撼世界的十天》。1967年初“一月革命”，傻乎乎的年轻人正为自己能躬身“震撼世界”的革命生涯而深感幸福与自豪。一年后不一样了。私人生活中的难题搞得我焦头烂额。仅此一点，足以说明面对政治激情全面沉落的社会背景，我个人的迷茫。

我和S匆忙地确认了恋爱关系，显然使我和Z的关系已无法挽回，我内心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年轻人尚未泯灭的真诚使我必须向Z作出解释。在1968年1月10日的日记中我记录了这件事：“我想马上离开学校。如果不和她见面，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她”就是指Z。我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如实陈述了我和S相识的整个过程并真诚向她忏悔。我至今记得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一些话，说当我们年近迟暮，回首往事之时，我相信我对党对人民都将问心无愧，但有一件事，我却永远会痛悔不已。这就是对与Z的事情处理过于草率。我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她正在风雨操场参加什么批判大会。见我穿过闹嚷嚷的人群向她走去，她显得意外激动。我永远记得那一刻她眼里闪烁的喜悦之光。我惧怕不已。我不敢看她，胡乱将信交给站她旁边的SH便匆匆离去。而Z，据同学告诉我，收信当天就哭倒在床，一两天不吃不喝。这让我恐惧万端。我没想到我对她的伤害会一至于此。事情一直到了第二年冬天，我终因“必胜”一文而被审查，前途吉凶未卜，那时候，这种内疚才稍有缓减：Z终没因我的倒霉而受到牵连，这使我自觉欣慰——这是后来的事。而1968年初，我只有远远避走一条路了。

这样，我就离开“战斗岗位”去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海口。南中国遥远的海岛上公然莫名其妙有一个重大八一五的忠实崇拜者：红卫兵海口第三司令部。该组织周年庆典，好像谁也没有请（至少我在他们的庆典上没遇到别的“革命组织”代表），偏偏给八一五总团发来一封非常热情洋溢的邀请信，这样我就去了，同去的还有张宗云和张国梁。是我主动向总团提出要求的。我这样做，可说纯属上面所叙述那一个私人原因。

海口给我的印象就是又荒远又静僻，如同成都郊区的乡镇。在那儿，我于他们的纪念庆典会作过一次演讲，出了一期两报合刊，除此之外，就是成天和三司一帮中学生厮混。南海的冬天迷人至极，闲来无事，我们常去沙滩拣拾贝壳，睡大觉，听海风把椰林吹得沙沙作响。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名神圣的十字军战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正在急剧堕落的世界。重任在肩，好像自己须臾离开，整个世界就会发生灾难。1966年10月开始大串联，很多同学都免费外出旅游，阅尽大山名川，而从小渴望游历天下的我却公然不曾为之心动。而今无所事事地躺在南中国海暖洋洋的沙岸，如卧桃花源中，不知秦汉，何论魏晋。正在震动着整个中国命运的灾难显得那么遥远。当时流行一个提法：“逍遥派”，也有叫“胖左派”的，指那些对政治斗争不热心、或者已经彻悟的、既不参加这一派也不参加另一派的人。一提“逍遥派”，两派都会嗤之以鼻的。以为对毛号召尚不积极，对国家大事尚不关心，此类人活在世何用？遑论担当革命接班人！可惜随着文革深入，事实上是逍遥派数量与日俱增。据说重庆第一中学食堂某日会餐，因分肉不均，欺负了“逍遥派”，“逍遥派”竟当场打出大标语：“胖左派不可辱！”足见逍遥者已是人多势众了。只是作为我个人，情绪变化至此，是自己始料不及的。

我们与三司合办的合刊未署《八一五战报》名，仅以《惊雷》第33期的名义付梓，时间是2月26日。我代表编辑部写了“敬礼，英雄的海口三司！”一文，作为对等的是，对方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紧紧握住你们的手，英雄的山城815战友”。现在重读这些无聊的游戏文字，我唯一能联想到的就是克雷洛夫寓言的一句话：“为什么公鸡要吹捧乌鸦？因为乌鸦吹捧了公鸡。”此外，二张分别写了“王关林和重庆八月战争”和“让革命大联合东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二文，算是对对方热情款待做了个交代，也算是我为红卫兵报社作完了最后一件事情，从此后就再没有参与《815战报》的具体工作了。海口归来，我直接回了成都，并且终于走向那间被“红八月”砸抄得狼籍不堪的斗室，和同样潦倒的老人呆在一起。文革以来，我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这么安静地呆在家里。斗室依然劫后景象：地板撬得光光的，泥地上铺满零乱的稻草。成都春寒料峭，我便整日价蜷在铺满泥地的草堆里读书，和父母亲一起评说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偶尔太阳出了，天暖一些，我就独自上街走走，看看还在继续上演的文革闹剧。时逢成都著名的“十中保卫战”。“八二六”打红成。我专门去现场看过一回，子弹霏哩叭啦打得热闹，可没伤人也没死人，比重庆八月战争，我觉得完全像看小孩子“过家家”，除了有趣，全无半点恐惧。我如此超然，皆因我的政治热情已经开始沉沦甚至麻木。我也去拜会一些小学和中学同学，老友重逢，彼此间好像都忘却了各自政治观点曾经有过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甚至还曾渴望为之献身。有一位姓Y的中学同桌在四川大学工作，我毫无芥蒂也毫无惧怕地去看他，那可是“八二六”派的老窝，校园里到处贴满批判《大局已定，815必胜》的大字报。我和Y漫步其间，很有趣地相视而笑，这些事好像与我毫不相干。记得Y还对我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该去大字报上批一句，“必胜作者到此一阅！”，看有何反应？

二月底，有消息传来，说毕业分配有结果了，我遂匆匆忙忙返回学校。那年二月月大，回到重庆是二十九日。回了学校才发现局势正乱，五年级的毕业分配根本没任何动静，而低年级同学还在满校园里热闹，写出不少大标语来。原来，中央要最终解决四川问题了，故而马上又要掀起一个“打倒刘张”的高潮予以配合，而且两派武斗又有山雨欲来之势。校园里的标语盖有如下内容：“打倒刘张，斩断黑手，围剿派性，实现革命大联合！”/“文攻武卫，彻底粉碎刘张之流武装夺取专县的反革命阴谋！”/“加强纪律性，恢复重大民兵师！”/“念念不忘专县！”等等。

我抓紧把那一段时间的战报索来检看，果然，就在我外出逍遥之时，2月22日至25日，全校一本正经地开了个“重庆大学首届战士代表大会”，并且刚刚通过了决议：“发扬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为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而拼死战斗！”。“决议”凡七条。此前十几天，2月7日至9日，全市12所大专院校八一五派还在建工学院召开会议，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个所谓“建院公报”，确认四川“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由于有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有四川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五十四军和其他驻渝部队这道伟大的长城，有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八一五革命派的浴血奋战，山城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公报号召全体八一五战士为“为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我返回重大的前一天，我校赴京参加中央四川问题学习班的人员刚刚在毛泽东塑像前宣誓出发。这次学习班的成员极其庞大，双方各约五百人。两派的主要头目全部入彀。江青在一次讲话中甚至大气磅礴地说：“你们七千万人的大省，才来一千人学习，太小气了，笑话！来七千人嘛！折中来四千也行。”这么多人到北京学什么？说穿了，无非把这些不安分的家伙统统软禁起来，省得放外面“山高皇帝远”，没完没了地胡闹。一个多月后，总团让我去北京做学习班班外联络员，我所观察到的事实证明了 this 判断——当时，各地区、各派都有我这样的联络员，在京城找个地方住下，每天就准时去学习班通风报信、交换情报。我们管每天去学习班叫作“探监”——学习班离城很远，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门由持枪军人严把死守，无法出入。问题是围墙——准确说是一排长长的铁栏杆，其功能很像亲属探监时横隔于探访者和被访者之间的铁栅——各地各派的联络员总是在每天晚饭后准时守候栏杆外，各地段约定俗成，互不干涉，都隔着栏杆交换情报。里面的人憋得难过，也常有翻越栏杆外出游玩者，彼此之间从不揭短，不管在政治问题上双方吵得如何之天翻地覆你死我活。重大一共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反正主要的头头全部就范。“815战报”的代表自然是王亦富，家里就留两三个看守编辑。而我的同班同学，广义地说，广大的五年级同学，回校拿了工资，一看局势不妙，马上又跑了个精光。我曾回班上看过，所有寝室都空空如也，一片狼籍。“建院公报”中专门写了几句话：“会

议严肃批判了‘逍遥正确论’的错误思想。指出，逍遥派就是不革命派。”对比现实，确也是无可奈何了。

签署“建院公报”共12个组织，现将名单按原顺序开列如后，供文革史家研究存录：

1，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2，重庆师专八一五战斗团、3，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4，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5，西南农学院星火燎原纵队、6，西南政法学院紧跟毛主席战斗团、7，重庆医学院九一五战斗团、8，重庆工业学院红色造反团、9，重庆交通学院工程兵战斗团、10，重庆邮电学院支革纵队、11，四川美术学院伏虎战斗团、12，重庆建工学院八一八战斗团。

还需补充的是，在“重庆大学首届战士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如下一句：大会“给我团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献身的二十四位烈士的家属，颁发了追认为我团优秀战士的证明书。”此举在现在看来当然毫无意义，甚至有点滑稽。只是由此可以确认重庆大学在文革中罹难的准确人数。加上后来死去的董继平，重大武斗死者当为二十五人，此数应该准确了。

当是时也，《山城战报》因几篇“四川时局”评而名声大噪，且大有不将刘张两挺评垮决不罢休之慨。我离渝期间，《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已约请四川外语学院一位老师续写“四评”：“再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兼评《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文章中所称的“看法和建议”是指“反到底赴京汇报小组”和“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在半年前，即1967年8月搞的一个“绝密”文件。不知道怎么给八一五派抓了个正着，以为是打倒刘张的钢鞭，于是“四评”声势就搞得尤大，由《山城战报》、《815战报》、《八一战报》、《山城红卫兵》、《星火燎原》、《机关战报》六家报纸联合出版。李乃如知道我已回渝，马上又约我写“五评”。我应约躲进了交际处（《山城战报》当时已搬该处），闭门造车，整整花了两个星期，到3月17日算是脱稿了，文章取名：

“把刘张推上历史的断头台”——几十年后，我已完全记不起那篇文章胡诌了些什么？为什么写？反正稀里糊涂就写了：可惜（可喜？）等不及文章发排，四川的政治舞台风云突变。

1968年3月15日，就是我的文章脱稿的前两天，周五日，晚上，八点钟，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四川省革筹组、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的领导。接见凡四个半小时。出席接见的中央领导众口一词，对“红成”和“八一五”几个月之“倒刘张”行动大张挞伐，骂了个狗血喷头。康生坚称：“反刘、张就是给李（井泉）、廖（按：指廖志高。四川省委书记）翻案。”周恩来干脆明确加码：“就是刘、邓复辟。”一贯喜欢出风头而又严重人格缺陷的江青当然又是指示又是插话，宣布反刘张“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风。”——虽然仅仅时过两年多，1970年秋，刘张二人就被同样这批首长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而被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一五”，作为四川文革的黑色星期五，给正得意忘形的八一五派沉沉地当头棒喝。

“五评”显然是不能问世而且必须马上毁掉了。如果不是撰写此文而查看当年日记，我已把此事完全忘却。关于3·15讲话，我当然是不会忘记的，因为我个人的整个命运，都和那次讲话有关。那就是：接见一开始，周恩来就说了：“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当然，仅仅从语法就事论事，这话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是，联系着整个讲话的意思和杀气，“必胜”一文显然其罪当诛了，要不，身为四川高校毕业生分配小组组长的张西挺，为什么会那么底气十足地宣布，说周XX“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反动文人”？

我们都必须面对现实了。圣光已经消失。我们开始觉得中央首长的讲话，已经不都是在代圣人立言了。即使代圣人立言，我们也以为它们不再神圣，更何况他们的信口开河那么地让人反感。时过几十年，我还能记起江青讲话的荒唐。其一是：“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这岂不比当初批刘少奇“资反路线”时批判过的“血统论”还“血统论”么！当时重庆盛传，化龙桥某人，其实不过杨的远之又远的远房亲戚，皆因当初杨在中央为官，于是逢人便喜欢吹嘘此段血缘——其实他半点好处没得过，而江青懿诏一出，该倒霉鬼却被雷厉风行地揪出来实施了“群众专政”。还有一句让人尤其恶心的江青名言也出自于“三·一五”指示：“李大章同志，（按：李为四川省原省长，江的入党介绍人）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你）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在如此神圣、关乎四川七千万生灵命运的场合大谈特谈几十年前的小恩小惠，并要对方为两个区区烧饼而必须保持所谓革命晚节，如此荒唐透顶的人竟执掌着八亿大国的命脉，我泱泱中华，其可哀也，何能甚哉！

我肯定是什么都不能干了。同学喜欢善意地向我开着残酷的玩笑，要我多多锻炼身体，吃饱喝足，他们打听过：南岸的监狱里每天只配给六两米饭。给我说这话的是武斗队的后勤部长陈捷。我对他的消息一笑置之。事后想起，他所说监狱情况，说不准真是经过了解的。因为武斗期间血案牵连，他后来真被监禁多年。说不准他对自己的命运已先有预感，想通过和开我这一类玩笑寻找些安慰。

那段时间，我的安慰是摄影。我迷得如此深沉，成天就只知道和“战报”的留守编辑黄肇炎一起探讨照片的反差和层次、上光和着色、米吐尔和几奴尼。我们在编辑部布置了一间暗房，用木架自制了一台放大机，并且自己配制显影和定影药液。正在谈情说爱的同学们都喜欢找上门来要我们冲洗女友、以及他们和女友一道亲热的生活照。我们从不拒绝。还有从“封、资、修”书籍上翻拍来的插图，当然都是男男女女，卿卿我我的，也拿来要我们复制，我们一律欢迎——反正无事可干，就学技术呗。

我的摄影技术正日趋完美，北京传来消息了，说学习班追查“必胜”风声日紧，“王二麻”无法招架，急电我速去北京候处：时间已到四月下旬。后来看资料，知道当时重庆武斗又起，若干地方交通再度阻断，但成天泡在暗房的我却浑然不知。那一日总团派人用摩托车带我绕道而行，径直送至杨家坪一片山岩下的长江岸边，再用一艘小艇把我送到朝天门，这时我才估计城里的局面一定很紧张了。

在轮船上无忧无虑地走川江，过三峡，尽阅高山流水，再换车从武汉到北京，已经时近“五·一”。几天前，即四月二十七日，前述中央首长们第二次接见了前述人员，因“三·一五”之后四川各地不停出现新混乱，首长们不得不将尾巴翘得高高的八二六和反到底训斥了一通，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把五十四军安抚一番——制造矛盾而又利用矛盾，使打得头破血流的两派必须求助于矛盾制造者，而矛盾制造者便得心应手，永远稳稳地高居其上。这种领导艺术，虽说早已不是什么秘诀，但却总是百发百中，屡用不爽。——“四二七指示”一下，不管怎么说，四川的局面又趋于缓解，至少，对于我来说，那篇“毛主席批判过”的“必胜”似乎已成了过时题材。而我，也就没必要再进铁栅栏里边去作“无谓牺牲”了，留在外面尚可以通风报信，发挥点机动人员的作用。这样，我就住进了前门外一条什么胡同里的高教部招待所。

我每天的任务当然就是按时“探监”。哥儿们呆得不耐烦了，翻墙越栏出来，我就陪他们去逛大街逛公园。那时候“坏头头”们翻墙越栏技术已炉火纯青，有人甚至暗中将栏杆敲断又虚掩现场者，进出就更方便了。当时我对照相术正迷得发热发烧，凡愿外出游玩散心者，我从来全程陪同并负责摄影留念。学生穷，就找了个窍门，到王府井的摄影器材商店去买过期的电影胶片，27定的作21定使用一点问题没有。因为过期，商店将电影胶片剪成五米一段处理零售，每米平均价仅为两毛一分，装进135相机，可以照出40多张来，很适合穷学生的消费

水平——我于是有了一项十分愉快的日常工作：制作胶卷、照相、冲胶片。包胶卷和冲底片都是用被子蒙住，全凭经验进行的。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没暗房，无法洗放照片。我统计过，那几个月仅我个人自拍的照片就近150张，其他人的则更多。仅从照片的数量就足以说明学习班的哥儿们玩得有多野。这样说吧，凡是当时有人（不管哪一派）说得出来的景点，绝对都被通通一扫光，包括远在门头沟外那座衰微破败的潭柘寺。而且常常是步行出游。十三陵之类的通用景点，更被走得熟门熟道。我们是在夕照苍凉中沿着燕山山麓行走的，沿途常会遇到北京大学生，三三两两，也作徒步之行，他们总是极其认真地扑在斑驳难辨的古石碑上，用作业纸和铅笔小心翼翼地拓碑上的字。他们工作得极认真，有时候一天仅仅能拓几个字。回忆“红八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中国的年轻人就轰轰烈烈破“四旧”、砸庙宇、烧字画，摔古董，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多，事情就完全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年轻人对残破的古代文化表现的热情，真是对当年自己荒唐的革命激情的最好讽刺。

回到重庆已是六月底。好像学习班已经结束，革委会成没成立却记不清楚——那时我对此已十分漠然。我在武汉姐姐家呆了很久才启程回重庆。船过三峡，重进四川省境，陡然发现局面仍旧可怕。船泊巫山，停靠了很久。先是在驾驶仓四周累满砂袋，接着把所有乘客统统赶下底仓。离岸不久，我们透过钢板的缝隙往外看，长江两岸的山坡上果然工事林立，枪炮严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来船靠涪陵，一群武装人员虎狼般冲上船来，令所有人等到甲板排队检查。涪陵是有名的砸派窝点，而我衣袋里恰恰装着《815战报》的工作证。列在队里，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以为这次被抓，当是凶多吉少了。1967年4月那次被抓，其时武斗尚未开打，而现在，有了“八月国内革命战争”的血腥锻炼，杀个把人，简直就如小菜一碟。有一刹那，我简直就自暴自弃了。我对我的同行者说，如果我不行了，你到重庆找谁找谁。同行者也是我一派的，成都人。他排在我边上，安慰我别着急——也算上天有眼，正在此时，有一被查者突然间和武装人员大吵大闹起来，队伍顿时出现了混乱。我趁机挪去后排站好，后排是已经检查过关的人。全船乘客太多，队伍里发生一点混乱谁也察觉不了。而且我还趁着混乱，眼疾手快地将《815战报》工作证扔进了身后滔滔奔流的长江。

这几乎是一个象征：我的红卫兵小报经历，在经过最后一次劫难之后，结束了。

我现在完整保留的报纸共有60期，即从1966年12月9日出版的创刊号至1968年3月20日出版的第60期。第60期是和《山城战报》合刊的。只有两版。和创刊号的气吞山河壮志凌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期满纸都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可奈何与言不由衷。这差不多就是一个表征：红卫兵作为毛泽东时代一个畸形的政治群落，从被利用到被遗弃，它短若蜉蝣的生命，已经开始消亡。60期第一版通栏标题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学习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重要指示”。下面是重庆八一五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通知：

“号召全体战士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重要指示，坚决贯彻落实红十条红五条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还有就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关于坚决拥护中央首长315指示的声明”。第二版也只有两篇文章。其一为社论：“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其二，两报编辑部“关于撤消《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并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的声明”。根据我当时在藏报上作的记录，这篇“撤消声明”是由我执笔写的，足见相当滑稽了。其后《815战报》又出了多少？什么内容？除零零散散保存了几张外，我一概不再了了了。

我所知道的只是，王亦富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以后，就完全负责起了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虽然当时谁也不再关心这个，《815战报》已经可有可无。王以一个小县城的孩子而能出人头地、能参加中央举办的学习班，能和重庆市的最高军界人物同机飞返，这些都足以让他非常自豪的。从北京回来后他情绪极好。于是后来，他被进驻学校的军人相中，入了伍，当了军官。

那一身象征中国最后权威的黄军装，曾让正在铁路工地接受军人“再教育”的同学羡慕不置。他当然也有理由很得意。再后来，他当了军长秘书。再后来，他开枪自杀：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百废将兴。

3 2，走边疆

下面是当时的几段日记：

“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这儿曾经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们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垃圾。”

“8月5日。事情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事情闹大了，自然牵涉到我个人：这个写‘必胜’的罪魁。阶级斗争太残酷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当初我们是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的敌人来看待，那么，他们胜利之后，也必然要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来看待，这有什么奇怪？”

“8月9日。到处都传抄着省革委首长接见重大815代表的讲话：‘必胜’的作者分配到哪儿呀？‘必胜’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反动的，你们知道吗？……”事实是，面临厄运的不光是我个人，而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日记没有记录我当时的想法：当我得知大学生们将和我一起倒霉的消息时，是不是有过些许安慰？

8月26日。姚文元那篇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开发表，文章把他们曾用以策动文化大革命的高等学校即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正式斥之为“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等等。文章把“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工农群众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患了近视症但还不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相提并论，居高临下地加以“奉劝”，实则是一并加以申斥。从此以后以至很久，“知识分子”紧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专政对象之后，正式列名第九，简称“臭老九”，成了一种准专政对象。七十年代，我曾某工厂当过为时不短的电工，师傅们对大学生动辄就“老臭”“老臭”地喊得顺口。开始心里很反感的，时间一久，也就习惯了，无非一种称谓罢了，何必自己找气生呢？在这个问题上，王二麻的态度一开始就很豁达的：“反正姚文元又没有奉劝我。老子从来瞧得起工农兵！一看见工农兵，老子就忙不迭喊爹喊妈：爹！妈！——你奉劝我干吗？”。

工宣队进驻重庆大学那天，哥儿们与其说是自发地前去欢迎，不如说是去看热闹。正是吃饭时间，大家把手中的饭碗敲得震天价响。发现队伍中有不少女工，大家尤其兴奋，很多女宣传队员都正值妙龄花季，相貌可人，不少同学暗暗动了凡心。

工宣队进校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日记都没有任何记录，大约心情太坏。然后到10月16日，日记本上又开始有了些断断续续的记录：“坚强起来吧！乐观起来吧！天塌不下来的，哪怕再大的苦难，哪怕再大的风浪，你都应该经得起。”10月21日日记：“不管是自我欺骗，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我还是希望着，还是追求着，我愿意把我的前面看作绿柳春光，而不是黄花秋叶。往事不堪回首，我愿意它们通通死去，而后踏着这具尸体，更加稳健地向前走去。”

10月22日那天，我把珍藏多年的信件全部烧了。日记上留了一首七绝：

缕缕火烟焚锦书
西风飒飒冬凉初

韶华如灰归去也
还望边陲叶正绿

这几则日记，估计是在我被弄进学习班审查之前写的。当时已风声日紧，我需要作些准备，同时也不敢再多记什么给自己添麻烦，我的日记便到此为止了。后来，一直到工作之后，也就再也没有了完整的日记。不久后，我被审查。

两派有争议的人物都被扣留下来不予分配。八一五当然多些。他们人多，干的事情多，名气太大，惹得麻烦也多。“智擒李井泉”的、参加武斗的、处理尸体的、虐待战俘的……问题随便一抓一大把，不管问题为真为假。“井冈山公社”人数寥寥，人们印象中，他们好像任何像样的事情都没干过，你能抓他什么把柄呢？没把柄。所以我印象中，他们的人一个都没有揪出来。苦了的倒是一些代人受过的“右派”（1957年被打的年轻右派，1962年又有些返校复读），因为同情反到底观点，于是被揪来陪了绑，弄我们一起被审查了。记得某晚学习结束，电机系四年级右派学生韩公第，一个弱不禁风的瘦高个儿，看见四下里无人，遂可怜巴巴地将我拽住，说他挨得好冤。他申辩他绝无反八一五之心，皆因无辜被疑，多次被班上的同学打得遍体鳞伤，说着就撩开衣服要我看他的满身伤痕。他的痛述使我很受感动。

他说我们人多势众，和工军宣队的关系又好，他恳请我替他代为疏通。其时，我和他同时被审，观点相同相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我亦正为自己的检讨书而焦头烂额，又何能对他援之以手呢？再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身份明确的右派，阶级敌人，我帮助他岂不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我对他表示理解。至于别的，我断然回绝了。

除了个别的如韩公第者流，学习班里写检讨的，全都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有时去参加全校的大会，我们这帮人一入场，全体同学便起而哄笑——称我们为新的“牛鬼蛇神队”——甚至掌声雷动。其意也，我们知道，有善意的嘲讽，也有无奈的酸楚。我们于是就友善地向哥儿们挥手致意。

韩公第说我们和工军宣队的关系好，这话确实没错。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军人宣传队员和工人宣传队员确实没有为难我们谁，他们审查我们，无非是要给气势汹汹的张西挺做个姿态、有个交代而已。如下一件事情可说明军代表的仁义。某同学Y，因被审查，其女友分配山东济宁，一到工作地便给他寄来绝交书一封。其书概云：她到了工作岗位，在老工人的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经过了斗私批修，深感她和Y的关系是没有革命基础的，故而正式分手，云云。读罢来信，Y的心中怒火不打一处来。下午的整个学习时间他都心不在焉，独个儿扑在桌上写字，就一句话：“火可以烧死人，水可以淹死人，但水比火更可怕，因为她有一幅温柔的面孔”，这句话翻来覆去地写，把一张白纸的两面都写得漆黑一团。军代表发现他对学习心猿意马，于是点名他发言，Y正当气头，一开口就骂娘：“说老子炮打林彪，炮打林彪，老子什么时候炮打过？现在好了，你们查了半天，查出没有？你们问题没查出来，老子的婆娘倒搞吹了！这算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军代表听罢，当即也一拍桌子，大吼：“你婆娘搞吹了关我屁事？说明她对你不忠嘛！这点考验都经不住，这种婆娘拿来干啥？再说你婚都没结，算什么婆娘？吹了，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军代表话忧未了，Y倒嚎啕大哭起来，哭罢，悻悻地摔门而去。这次种极不礼貌的行为，军代表不过一笑置之，并没有找任何麻烦。不久，Y和我们同时离开四川。他去了遥远的北方。八十年代，他又远渡去国，成了美利坚公民。

我的问题关键是交出后台。人家说像“必胜”这样高水平的东西，年轻人是写不出来的，尤其工科大学的年轻人。我能有什么好交呢？该“大毒草”整个儿就是我自己的主意。一次交不出来，又继续交代；不行，再交——后来实在走投无路，便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已被揪出。他问题严重得很呢！一九四八年他就

去过台湾，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跑回来，很可能是潜伏特务。开始他在川报做编辑，皆因历史问题才弄下来教书的。我的朋友们动员我，说反正李是在劫难逃了，在他本已非常严重的问题上多加一条罪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再说，他本身就是《山城战报》主编，说他黑后台也不冤枉——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主意。我对李印象一直不错，但为了保我自己过关，我终于在交代材料里违心地诬陷了一位可尊敬的长者。几十年后，检讨自己一生行为，我为此深感痛悔。如果李先生健在，我愿意真心地向他表示我的歉意。

我被放出来了。所有八一五被审查的人员几乎都一齐放了出来。四川是我的故乡，却又是非之地，我们那样眷恋它有那么仇恨它。担心事情有变，夜长梦多，甚至来不及告诉父母，就在拿到“报到证”当晚，便急急忙忙买车南下了。时间是一九六九年旧历岁末，春节悄然将临。我们没工夫在故乡等待节日。那一夜，重庆夜色如磐，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我走了。

火车拥挤不堪。车上，意外发现一拨和我们同样亡命天涯的重庆中学生，他们认出我们了，就主动前来攀谈。当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他们想躲避“广阔天地”的逼迫。而“八一五的亲密战友”五十四军已经调防云南，中学生们想前去那儿从军。和我同赴云南的共三人：黄顺义，还有冶金系同学张应田，都是被审查的“班友”，加上这一拨中学生，一起沦落天涯，路途相遇，我们夜夜作达旦之谈，丝毫不觉困倦——真正的寂寞是从昆明开始的。

我和大家作别，继续驱车西向，从此后便各自赴东西，为险恶的命运奔波。张应田不久后死于工伤。黄揪回重庆审查。而那一帮中学生，从此消逝在茫茫人海，连姓名都全部遗忘。

那真是漫长的路程啊！从昆明到边疆保山，几十年后的今天仅八小时车程，而那时需要整整四天！横断山重岩叠嶂，陡峭的山路断弦游丝般在崖头飘动。车过风城下关，幽黑的苍山山头还飞着碎雪。越后来道路越加险峻了。两旁的云团像沉疴不起的巨兽，一群群横卧峡谷中，好容易出了山峡，终于看见一个狭长的灰黄色的坝子，牛车在路上毫不动气地缓缓行过，辐条四射的木轮像古老的太阳化石，慢悠悠地碾着山里悠长的日子。有人告诉我，说保山到了——我突然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块荒远的土地上终有一个属于我的生活驿站了。

面对陌生边地，我突然口占了一首七绝：

苍山雪岭脚下踏，
横断山头驱长车
花街灯市何足恋
边陲自古男儿家

我预感到我将同命运进行新的抗争了。我将会遇到更多的悲欢、厄运、成功、失败，还有我无法拒绝也无法知晓的故事。

记录这些故事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全文完）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